

热历史

千年杂技 技惊四座

广义的杂技是各种超常技艺的统称，古代又称“杂伎”“杂技术”。

中国杂技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萌芽。秦统一中国后，吸收各国角抵的优点，形成了一种娱乐性的杂技节目角抵戏。

汉代，角抵戏的内容更充实，品种更丰富，技艺更高超。到东汉时，则形成了一种以杂技艺术为中心，汇集各种表演艺术于一堂的新品种——“百戏”体系。

南北朝时期，各族艺术交流频繁，使这一时期的杂技呈现出兼收并蓄，多姿多彩的特点，不仅民间基础丰厚，而且各朝宫廷表演也异彩纷呈。

唐代时，一些节目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超技艺。其中“载竿”之艺极高，马术节目也有很大发展，驯兽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自宋代起，杂技艺术开始从宫廷走向民间，创造了名目繁多的新节目。瓦舍、勾栏的兴起使艺人有了易合易散的卖艺场所，此外，宋代还有了专业的杂技班和培养新人的“科班”。

宋代以后，杂技的社会地位江河日下。元朝建立后，杂技沦落为走江湖、耍把戏的江湖艺术。清代艺人则多以家庭亲属为基础“撂地”演出，或靠赶会流动演出，以维持

生计。至近代，杂技更被贬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下九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杂技艺术获得新生。杂技艺术从简单的技巧表演发展到有乐队、舞蹈、灯光等配合的综合艺术表演。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当代中国杂技已成为深受全世界人民喜爱的艺术奇葩。

中国杂技的艺术特色，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特别重视腰腿顶功的训练。中国杂技艺人，即使是表演古彩戏法的演员也都要有扎实的武功基础。第二是险中求稳、动中求静，显示了冷静、巧妙、准确的技巧和千锤百炼的硬功夫。如“走钢丝”中种种惊险的表演，都要求“稳”。第三是平中求奇，以出神入化的巧妙手法，从无到有，显示人类的创造力量。第四个艺术特色是轻重并举，通灵入化，软硬功夫相辅相成。最能表现这一艺术特色的是“蹬技”节目。第五是超人的力量与轻捷灵巧的跟斗技艺相结合。例如，在当代的《千斤担》节目中，一位老演员手举脚踏同时举起四付石担和七、八个演员，负重达千斤以上，表现了超人的力量。

▲《杂技俑》泥塑



▲《杂技俑》泥塑

《文摘报》

连载

泛舟之役

晋献公二十六年，献公病逝，在秦国逃难的公子夷吾回国做国君，即晋惠公。当初，夷吾为回国即位，对秦穆公说，你如果支持我回晋国做国君，我将划五座城给秦国。晋惠公即位后，秦国要求晋惠公划城池，惠公说：“晋国的土地是祖先留下来的，我怎么能划给他人？”此时，晋国连续几年遇到灾荒，五谷不收。惠公四年，晋国又发生饥荒，仓廩空虚，只好向邻国买粮。晋国君臣想去，秦国离晋国最近，两国之间且有婚姻关系，所以就向秦国买粮。因为在割让土地上有负于秦国，惠公不好意思开口。晋国大夫郤芮说：“我们不是辜负秦国，河西五城只是暂缓交割，如果秦不卖粮于晋，那就是秦国对不起我们，所谓有负秦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惠公认为有道理，就派大夫庆郑到秦国买粮。

秦穆公召集群臣议卖不卖粮给晋国，大臣们纷纷发表意见。蹇叔、百里奚都认为天灾是无法避免的，帮助邻国理所当然，主张卖粮。穆公认为自己有恩于晋，晋却不思回报，有点迟疑。公孙枝说：“我们对晋国施恩，本来就没想过要回报。他们不回报，我们也没损失什么。他们不能知恩图报，错在他们，我们还是应该卖粮的。”逃亡在秦的晋国大夫丕豹却认为：“晋君无道，这是天赐良机，我国正好借机灭晋，机不可失。”大夫繇余说：“仁者不乘危以邀利，智者不侥幸以成功，秦国不可乘人之危，我们应当卖粮给晋。”穆公考虑再三，说：“有负于我国的是夷吾本人，不是晋国的百姓。受到饥荒威胁的是晋国百姓，我不忍心因为国君有负于我而让百姓挨饿。”于是，秦国派了大量的船只运载了万斛粮食，由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南）出发，沿渭水自西向东而下五百里水路，横渡黄河以后再溯汾河漕运北上，直达晋都绛城。运粮的帆船从秦都到晋都，八百里路途首尾相连，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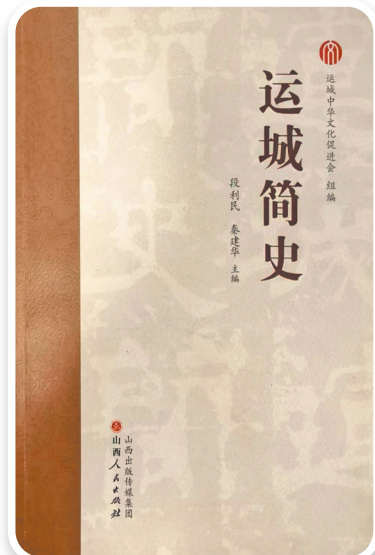
重耳归国

晋惠公十四年九月，惠公夷吾卒，他唯一的儿子圉在绛城即位，即晋怀公。

当初，公子重耳逃到封地蒲城（今临汾市蒲县），献公派人追杀，蒲城人要求与来人交战，重耳说：“不可，这些人是为了求生而执行国君的命令，与之对抗罪莫大焉。我还是逃走吧。”于是逃往舅氏狄人之地，跟随的人有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等。

到了齐国，齐桓公给重耳又娶了妻子姜氏，还赠送良马二十四匹，重耳有乐不思归的感觉。几位随从觉得不妥，在桑树下商量怎样才能离开齐国。这话恰巧被采桑女听到，采桑女告诉了姜氏。姜氏对重耳说：“公子有四方之志，为了不泄密，我已让那女孩自杀了。”重耳说：“我没什么大志。”姜氏与狐偃用酒把重耳灌醉，扶上车离开了齐国。

走到曹国，曹共公听说重耳是个肋骨连在一起的人，想观察他的裸体，在重耳洗澡时，让人隔着纱帷



一观究竟。曹国大夫僂负羁的妻子对丈夫说：“我观察晋国公子的五位随从，个个都有相国之才，一旦回国，将来必然称雄于天下诸侯，第一个要报复的国家可能就是曹国了，先生何不早点结好于他们？”于是请重耳吃饭，在饭下放了一块玉璧，重耳用罢餐，把玉璧归还了主人。

重耳一行人到了宋国，宋襄公赠送宝马香车二十辆。又到了郑国，郑文公却不礼遇。郑国大夫叔詹劝主公说：“我听说天若是要谁发达，人是挡不住的。晋国公子有三个特点，恐怕天要成就他，您需对他以礼相待。他父母都是姬姓，却健壮超过常人，此其一。虽出逃在外，从不危害于晋国，此其二。有三位高谋，足以做人上人，何况他有五位，此其三。”郑文公不听。

重耳一行到达楚国，楚君请他用餐，席间问道：“有朝一日公子得回晋国，将怎样报答我们的一片热忱？”重耳回答道：“子、女、玉、帛，楚君样样不缺，羽、毛、齿、革制作美玩，正是楚国特有。凡晋国之所有者，对您都是多余的，我没什么可以报答您。”楚君说：“话虽如此，总得报答些什么吧？”重耳说：“如果托先生之福，返回晋国，我日晋、楚两国不幸交兵于中原，我对您退避三舍。若还不得已，那就驾着战车，握着角弓，与君周旋。”楚君说：“晋国公子志向远大，彬彬有礼，几位随从忠肃宽厚，堪称大任。上苍若使唐叔虞之后兴旺发达，就在你这位公子吧！”随后把这些人送往秦国。

晋怀公元年正月，重耳在三千秦兵护送下返回晋国。走到黄河边的时候，狐偃拿出一块玉璧递给重耳，说：“臣我鞍前马后跟随你巡行天下，得罪的地方太多了，我清楚，你更清楚，就从此分手吧。”重耳说：“我哪敢不与舅父同心，请河神见证吧！”说着就把玉璧投进河里。从蒲津关（今临猗县吴王渡）过了黄河，包围了晋国的令狐邑（今临猗县令狐村），又进入桑泉邑（今临猗县城西村），接着攻取了臼衰邑（今临猗县程村）。此时，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卢柳邑（今永济市城子埭村），秦穆公派公子紫到晋军中说服晋将吕甥、郤芮不战而退，向东开拔到郇邑（今盐湖区西曲樊村）。二月辛丑日，狐偃与秦、晋两国大夫在郇邑达成盟约。次日，重耳进入晋国军中。第三天，重耳到达曲沃城（今闻喜县上郭古城）。第四天，朝拜曲沃武公之庙，正式即位晋君，即晋文公。（19）

文史漫步

一方水土一方犬



▲运城博物馆“大汉光影”南阳汉画像石拓片精品展“田猎”拓片 本栏图片 记者 刘亚 摄

中华田园犬，它们并非一个依据特定外貌和性格特征进行人工选育后形成的标准化“品种”，而是一个历经万年自然选择与地理隔离，与中国人文、地理环境高度融合的原生犬种总称。

在先秦典籍中，犬的形象随处可见，分工明确。据《周礼·秋官》记载，当时已设有“犬人”一职，“掌犬牲”，负责饲养不同用途的犬，如用于祭祀的“牲犬”、用于捕猎的“猎犬”，以及用于看守的“田犬”，这“田犬”正是中华田园犬最直接的词源祖先，意为守护田地房产的犬。

在狩猎方面，《诗经·齐风·卢令》中“卢令令，其人美且仁”的诗句，就描绘了猎人带着黑色猎犬（卢）出猎的矫健场面。这表明，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优良的猎犬是重要的生产工具。

在汉代的墓葬中，形态各异的陶犬与狩猎题材石刻画是极为常见的随葬品，被认为能够继续在阴间守护墓主人。而在更具悲剧色彩的历史叙事中，犬亦是忠诚与乡情的终极寄托。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朝名相李斯曾对他的儿子感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兔，岂可得乎！”

李斯也怀念曾经与爱子牵着黄狗在家乡上蔡东门外追逐野兔的平凡欢乐。“黄犬”自此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化意象，承载着对故土和田园生活的无限眷恋。

广袤的华北平原则是猎犬“河北细犬”的故乡。细犬是中国古老的视觉型猎犬，体型瘦长，线条优美，拥有流线型的身体结构，这一切都是为了极致的速度而生。它们曾是古代王公贵族围猎时的爱宠，在许多古代绘画中都能找到它们矫健的身姿。一些神话著作也指出，哮天犬的原型就是细犬。如《西游记》中写道：“（孙悟空）被二郎爷爷的细犬赶上，照腿肚子上一口，又扯了一跤。”

在贵州东南部，生活着一种极为独特的原生犬种“下司犬”。它们因主产于麻江县下司镇而得名，是中国唯一的世界级猎犬品种。下司犬外貌奇特，面部和嘴部的毛发短而硬，酷似“白胡子老头”，嗅觉灵敏，耐力超群，被当地苗族同胞誉为“追山犬”，是山地狩猎的绝佳伙伴。

山东的莱州红犬，这是一种大型护卫犬，以其鲜明的红褐色被毛和高大的体格而著称。四川地区的青川犬、江浙一带被统称为“柴狗”的本地犬等。（《北京科技报》）